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动地比喻为党内“共同语言”，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基础科学和必修科目，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注意结交有“共同语言”的朋友。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表示“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罗章龙看到启事后，当即与毛泽东相约见面，畅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别时，毛泽东高兴地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当时，毛泽东身边聚集着一批志趣相投、意气风发的同学和朋友。他们朴实而充满朝气，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也正因为一起追求进步，立志改造社会，这批青年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后来提及学会的发起经过，指出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大家通过深入交流，“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可以说，“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就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是在这—“共同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气质和风采。

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团体，“共同语言”的根基在于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2月，毛泽东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明确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这样，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1920年11月，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进一步强调，新民学会的结合要有共同信仰的主义，“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毛泽东最



毛泽东谈党内“共同语言”

□ 毛 胜

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1921年1月，他复信蔡和森时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入摇动。”他认为蔡和森关于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见地极当”“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知陈独秀等人正在推进建党一事，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无愧于“旗帜鲜明”四个字。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要想改造中国与世界，就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要有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个“共同语言”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党内同志，克服种种困难，聚集一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从未有过的难题。如果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革命会遭受严重挫折。这让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汇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同志，也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缺乏行动上的“共同语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

通过反思革命斗争的失误教训，毛泽东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唯有如此，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才会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在起草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议案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这个错误，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次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接着，毛泽东总结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经验，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

们的斗争中，证明了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带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夏，他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了3个多月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110多小时。他在精心准备的讲课提纲中写道，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才能避免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

学习掌握辩证法唯物论，就是要熟练掌握党内“共同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针对党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抗日战争问题出现的不同声音，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分析，让全党同志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整风运动所整顿的，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

的主观主义，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优良作风，则是重中之重。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鲜明地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共产党的天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1942年2月，他又接连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必须“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开展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经过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事求是”成为党内“共同语言”。陈云多年后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

干革命需要“共同语言”，搞建设也不例外。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

一步强调要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必读《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12本著作，强调党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

带着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地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反复强调“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指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共同语言”的认识之深刻，也足见他为加强全党理论学习的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经过艰辛探索，毛泽东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内的“共同语言”。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全歼东北敌军最大之战役

辽西战役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盛 雷



辽西战役烈士纪念塔位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励家烈士陵园。励家镇旧称励家窝棚，1948年10月26日凌晨至27日傍晚，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以下简称“6纵”）以2个师2万余人的劣势兵力，在励家窝棚一带成功阻击国民党军队10万余人撤回沈阳，为主力部队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有利条件。为纪念在励家窝棚阻击战中牺牲的2100余名烈士，黑山县人民政府于1954年7月修建辽西战役烈士纪念塔。该塔坐北朝南，塔高7.5米，采用砖石水泥结构，呈方椎体，塔尖上有一枚镰刀锤头标志的红色五角星，寓意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塔身四面均镌刻题词：正面为“辽西战役烈士纪念塔”；背面为中共黑山县委、

黑山县人民政府所书“功在人民，虽死犹荣，为人类解放奋斗箴行，光荣不朽”。东面为时任6纵副司令员杨国夫所书“革命烈士 万古流芳”；西面为时任6纵政治委员赖传珠所题碑文，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辽西战役是四野最后全歼东北敌军最大之战役。四十三军区（在）四野首长整个战役指挥下，奉命率领两个师向黑山以南挺进和（并）抓住敌人，阻止援敌，防之（止）敌六十师向沈阳营口回窜之企图，终在黑山县以南地区与敌遭迂（遇）。经过一昼两夜之激战，曾数度肉搏，以少胜多，和（以）坚决英勇顽强地（的）战斗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对此役全歼敌军有着极大之意义。

烈士们，安息吧！你们的代价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赖传珠

碑文仅180余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6纵在辽西战役期间的作战任务、战斗经过。寥寥数语，不仅反映出战局的瞬息变化、战况的无比激烈，而且寄托了对烈士的无尽哀思，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怆然动容。

与敌周旋,断敌退路

辽西战役是锦州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与廖耀湘兵团之间的对决。在这场对决中，6纵起到关键性作用。

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给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1948年10月18日，蒋介石飞赴沈阳，命令滞留在辽西彰武的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廖耀湘兵团全力向黑山、大虎山方向进攻，企图重新占领锦州，打通东北国民党军总撤退的陆上通道。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东总”）密切关注东北国民党军的动向。在察觉到廖耀湘兵团南下意图之际，立即电报中央军委，准备将其一举歼灭。在得到上级的肯定性批复后，东总下定决心在辽西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10月20日18时，在发给各纵队的政治动员令中指出，“目前我们决以我东面打援之部队与攻锦各部首先抓住从沈阳出来之廖耀湘兵团，从野战中歼灭之”。随即东总制定“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的作战方针，务求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并一举歼灭。

此时的6纵正隐蔽集结于彰武东北方向，原计划准备阻击自长春突围南下的国民党军队，防止其与廖耀湘兵团合兵一处。随着长春解放，6纵的作战任务改为“拖住后尾”，即在廖耀湘兵团主力南下后，包围彰武，诱敌救援，使敌首尾不能兼顾，为我军

10纵“拦住先头”、攻锦主力部队折返“夹攻中间”争取时间。战斗中，6纵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从侧后方袭扰敌军，令廖耀湘极为头疼，不得不命令国民党新3军断后，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10纵在黑山阻击战的战场压力。

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廖耀湘兵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遭到我军顽强阻止后，既没有全力向营口突围，也没有迅速撤回沈阳。敌军的犹疑不决对东总的敌情判断和作战部署构成不小的挑战。直至25日黄昏，东总判定敌军将撤回沈阳，于是急令：6纵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的前后十八家子、关家窝棚、励家窝棚一带，以切断廖兵团的退路，造成对敌夹击之态势。26日凌晨4时，6纵赶到预定地点，截断敌军撤退的铁路、公路要道。此时，6纵的作战任务由拖住敌人改为阻击敌人，辽沈战役期间最为激烈的一场阻击战即将打响。

英勇阻击,浴血辽西

自24日傍晚奉命自彰武南下，至26日凌晨抵达预定地点，6纵连续作战一昼两夜，转战100余公里，部队已经相当疲劳。此时，6纵先头部队与敌新3军14师一部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趁敌人惊慌失措之际，我军迅速将其击溃，并进行纵深穿插，巩固励家窝棚、姚家窝棚阻击阵地。经过激烈的短兵相接，战场暂时归于平静。此时6纵意识到，所面临的敌情相当严峻。6纵正面和左翼为

敌新3军、新6军各一部，右翼为敌新1军、71军主力，敌军总兵力达4万余人。此时6纵17师因参加锦州战役尚未归建，仅有16师、18师2万余人。由于此战遭遇战，6纵来不及构筑防御工事，在一片开阔地，只能依托周围几个村庄的民房与敌激战，打退敌军数次进攻。

26日下午，东总发来电令：我主力兵团已向黑山、大虎山东南地区及新立屯全面出击。在大部队到达之前，6纵必须坚决死守阵地，堵住逃敌，务必坚决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廖耀湘接到卫立煌电令，令其迅速突破我军阵地，撤回沈阳。随即，敌军集中兵力，向我军发起潮水般进攻，妄图夺路而逃。面对敌军疯狂进攻，6纵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阻击，寸土不让，与敌军反复冲杀。18师52团坚守励家火车站，连续打退敌军14次进攻。16师在姚家窝棚阵地顽强阻击敌新1军、71军主力，战况异常激烈，46团政委张天涛、参谋长程元茂、47团副团长刘富贵相继英勇牺牲。经过一昼夜激战，敌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27日凌晨4时，随着我军主力抵达战场，敌军瞬间崩溃，被我军分割围歼。晚7时，6纵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至28日拂晓，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全军覆没，辽西战役胜利结束。

在励家窝棚阻击战中，6纵激战一昼两夜，以牺牲2100余人的代价，歼敌2.6万人，为辽西战役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经此一战，16师46团牺牲1000余人，“有九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战后东总颁发嘉奖令，称赞16师在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这是光荣和壮烈的”。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